

导言

2020 年伊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为应对这一罕见的大流行病给公共卫生、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都依据各自国情，采取了不同的防控举措。为了厘清各国抗疫的思路、机制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联合开启了“博雅德信工作坊：外交官眼中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系列线上研讨会。

自今年 1 月 31 日报告首两例感染病例至今，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25 万例，死亡超过 3.6 万例，一度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过去的 3 个多月，英国疫情防控经历了从最初的政府盲目自信、漫不经心，到首相、政府高官感染病毒引全球关注，再到决策部门关于何时进行封锁产生分歧，进而引发“黑色 4 月”确诊、死亡病例数成倍猛增的灾难。不少英国人认为，正是由于政府的犹豫不决和决策误判，才使疫情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但也有人指出，国家束手无策的最大的原因是公共服务过度私有化，特别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的过度私有化和低预算进而引发的全民公共卫生安全危机。

英国政府的抗疫措施为何会经历上述变化？“群体免疫”措施是否有效？一再推迟执行封锁措施的原因是什么？疫情会给已“脱欧”的英国带来哪些影响？本期工作坊邀请到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教授，经济学院苏剑教授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

化、公共卫生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研讨。

“博雅德信工作坊”第34工作间

外交官眼中的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英国

2020年5月29日

本期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主持。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首先做主旨报告。

马大使的发言主要围绕英国疫情的总体情况、疫情对英国的影响，以及中西抗疫差异的文化根源三个方面。首先，他回顾了英国的疫情发展和抗疫过程，指出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暴发突然且来势凶猛。很短时间，疫情蔓延至世界211个国家和地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全球确诊病例高达567万，死亡人数达到35万多人；二是新冠病毒不分人种、地区和国家，无论是发达或不发达国家都受到波及。例如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且最强大的国家，却是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马大使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国家对于防疫的重视态度和采取措施的不同。他将各国防疫的方式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全党全国动员，采取一切措施抗疫，最后取得了控制病毒蔓延的阶段性胜利。第二种是欧洲模式，如比较突出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这些国家的抗疫大多经历了相似的过程：第一阶段是漠不关心；第二阶段虽有感染病例，但不太严重，所以仍没有重视；第三阶段感染人数剧增，开始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但实施过程一波三折；第四阶段疫情逐渐度过高峰，

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逐步下降，国家开始恢复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第三种是美国，表现为特朗普政府不重视，只关心大选和连任，因此不断向中国甩锅，推卸责任。由此一来，导致美国防控措施不到位，疫情迅猛发展，目前（截止5月末）感染人数高达170万，死亡人数超过10万，遥遥领先于世界。尽管当前部分州出现转机，但就全美而言，仍未出现疫情的转折点。

具体到英国，一方面英国的疫情开始较晚，1月31日才出现首例确诊病例，2月也只有零星病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2月18日习近平主席和约翰逊首相的通话来看，虽然约翰逊对中国人民表示慰问，对中国的行动表示赞赏，也表示继续向中国提供支持和援助，但他的语气完全是一个旁观者和同情者的立场。但另一方面，疫情在英国蔓延的势头较快，3月开始确诊人数迅速增加，至5月初，累积病例已超过20万，死亡人数超过3万，位居世界前列。约翰逊在3月23日与习近平主席再次通话时，态度已发生重大转变，称要借鉴中国经验，感谢中国的支持与帮助，赞同习主席主张的疫情无国界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此外，英国疫情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一些达官贵人都被感染，如首相约翰逊、王储查尔斯、卫生大臣等。

马大使指出，英国在疫情初期，由于医疗设施不够、能力不足，一度采取轻症不测、只检重症的举措，许多病患没有得到及时的检测和治疗。其后果是许多病毒携带者潜伏在社会中，一旦暴发情况变得比较严重。但与此同时，在吸取西欧各国的经验教训后，英国后期的防疫措施总体上是比较

到位、比较迅速和比较坚决的。例如：约翰逊首相宣布了国家行动计划；3月12日将疫情风险等级定为高级；16日宣布加强防控，要求有症状者及其共同生活的家人居家隔离14天，呼吁民众居家办公，取消不必要的社交和旅行；20日要求学校停课，暂时关停酒吧、餐厅、剧院和电影院等公共设施；23日采取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停止聚集活动，关闭销售必要物品以外的商店，以及体育馆、图书馆和宗教场所等。此外，英国还积极地参与国际抗疫合作，不仅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捐款数亿英镑，还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疫苗的研发。

马大使认为，目前英国应对疫情的态度仍比较谨慎，但已经开始考虑恢复日常活动。英国政府提出解封的五个条件，其中包括每日新增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感染率下降到可控水平，疫情不会出现二次暴发等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以适度、微小、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封。5月10日英国政府公布了相关路线图，宣布英格兰地区将分阶段和领域逐步解封，如允许部分不具备居家办公条件的行业复工妇产，小学生6月1日起分阶段返校等。另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决定。总体而言，英国疫情防控经历了从最初不重视，到重视却措施不到位，再到措施逐渐到位，态度积极，取得相对的成效。虽然目前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仍在增加，但增长率正逐步下降，已经爬过高峰。

关于这次疫情给英国带来的影响，马大使认为影响是全面的，其中经济影响可能最为严重。比如涉及英国的脱欧问题，英国折腾了三年才终于在今年年初实现脱欧，但后面仍

留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约翰逊原计划到今年底脱欧基本告一段落，但疫情的暴发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完成。在脱欧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下，英国的经济将严重受挫，可能会陷入 300 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数据显示，英国今年一季度 GDP 环比萎缩了 2%，二季度可能面临更大速度的下滑；失业率达到十年来的最高，4 月申请失业的人数达到创记录的 85.7 万人，估计全年税收将减少 1300 亿英镑。对此，英国政府出台了各项支持政策，除了专门划拨 300 亿英镑预算应对疫情，还面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推出了总额 3500 亿英镑的帮助措施，包括 3300 亿政府担保的优惠利率贷款和 200 亿直接财政支持。另外，政府还出台补助金计划，帮助企业支付员工 80% 的工资，该政策已惠及 1000 万人。目前英国的经济仍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其后期会有所好转，但不会有太大起色。

马大使指出，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英国在脱欧后正寻求新的出路，它无法像过去那样与欧盟国家共同奋进，而是要独自前行。但在脱欧之初，许多出路还没有落实，例如与美国商讨相关协议、脱欧后与众多国家重新谈判条约，以及提出全球化的英国，还要向世界各国重新开辟联络渠道等，这些事情都未有定论。约翰逊肩负着重担，未来英国应如何处理与欧洲的关系仍是未知数。但英国的优势在于，它的经济是开放的，其外贸和投资在世界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基础扎实，若能充分利用，总体上不会太差。

关于对政治的影响，马大使观察到英国并不像美国那样明显，主要的问题是这些年出现的民粹主义，特别是围绕着是否脱欧的争斗非常严重。不仅社会的割裂和两党的斗争非

常激烈，而且保守党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受疫情影响而被暂时搁置。总之，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任一方面来看，疫情只是加剧了英国的困难程度，许多问题在疫情过后仍需陆续解决。

马大使重点介绍了中西方抗疫背后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迥异。对于为何中国能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而拥有高水平医疗卫生设施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如此困难这一问题，他指出，除了表面的体制不同、戴口罩难易等原因，更应该探讨深层次的文明或者文化差别。通过这次抗疫，他看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优越性，在关键时刻比基督文明更高级。中华文明在疫情中展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第一，以人为本。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人是最宝贵的，而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原则就是为人民服务，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这次抗疫中，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把人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采取了最严格的措施，国家不计一切成本，所有感染者的治疗全部由国家包干，不收取医疗费，这是西方国家所做不到的。反观他们，在疫情初期提出“群体免疫”，其思想本质是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健康，这种观点在中国难以被接受，但却被西方视作一种解决办法，目前瑞典就在践行此抗疫理念。尽管英国没有真正实施这一政策，但由于全民医疗制度存在质量低、服务差、拖延等诸多弊病，许多穷人和老人实际上都无法得到及时且良好的治疗。虽然西方也讲人道主义，但它们的人权和人道并不是世界所有人都可以共享的，例如在美国最初只属于有钱的白人，后来随着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民主运动，女

人、穷人和黑人才逐渐获得选举权。可见，基督文明中的“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的概念并不一样。

此外，西方现在的民主选举已经完全变味。西方最重要的民主方式是选举民主，由此又产生多党制。这两点往往是西方衡量中国的标准，他们指责中国的官员不是选举产生，且没有实行多党制。的确，西方文明的初期确实体现了民主，但目前诸如英、美等西方大国的大选民主却大相径庭，它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当选，代表自己党派阶层的利益，可以不顾全民的利益，因此选区利益与全国利益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

第二，天下皆兄弟，天下为公。中国人的努力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整个世界。这正是中国的人类大同思想，在抗疫中就表现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到处都是兄弟姐妹。然而西方就不大一样，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也要求人们碰到困难挺身而出，帮助别人，但缺乏中国人的全民理念和全民意志，所以中国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无法在这些国家奏效。

第三，顾大体。中国人将国家和社会摆在个人之上，这是一种传统的爱国思想。例如，疫情之下很多人都有个人困难，但考虑到全国，他们依然服从安排。对拥有 1100 万人口的武汉来说，突然的封城对它造成的艰苦可想而知，但武汉人民承受了这一切，因为他们心系湖北省和整个中国。这在西方人眼里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意识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这种文化差异在这次防疫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

第四，反对种族主义。西方人心中总认为白人和基督教最优越。在疫情之初，一些西方人以为这个病毒主要在亚洲人或黄种人之间流行，可能不会侵犯白色人种，所以西方社

会出现了排华、反华情绪，许多华侨华人都受到了社会的歧视，甚至遭到谩骂和毒打，他们把华人称作病毒的传染者。虽然人数不多，但反应出一种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最开始并没有把新冠病毒当回事，并且还对中国的疫情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态度。

最后马大使提醒大家要注意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出现追讨所谓中国责任的声音，特朗普等美国政客不断地向中国“甩锅”。那么作为美国的特殊伙伴英国，尤其是脱欧后英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增大，其国内也有部分人紧跟美国的步伐。在此情况下，不排除英国也会采取一些反华或不利于中国的政策，比如有报道称英国在华为问题上已经开始有所动摇。总而言之，中国在疫情中的突出表现提高了国际影响力，但同时也应时刻警惕，在世界大格局复杂变化的今天，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西方一些政客用作攻击中国的手段和借口。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教授也谈论了对东西方抗疫表现不同的看法。他提出抗疫具有阶段性，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普遍表现比较差，尤其是与东亚国家相比。比如美国死亡总人数最高，英国人均死亡率位居世界前列。针对这一现象，他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新冠病毒具有特殊性。与以往那些死亡率高、传染性较低的冠状病毒如埃博拉、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不同，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很高，死亡率较低（虽然比前面几种病毒的致死率低很多，但比一般流感高很多）。而应对这

种特殊病毒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研发特效药和疫苗；二是隔离阻断，即把人分开，避免传播，西方国家称作保持社交距离。第一种办法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因为研发需要时间，而且未必能成功，比如人类和艾滋病斗争几十年也没研发出特效药和疫苗。因此，短期内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阻断，但这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使西方人难以承受：一是限制人的自由。隔离阻断后，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各个地方，人与人的交往也受到限制。由于他们仅把新冠病毒视作严重的流感，因此无法理解为何要被限制自由；二是导致经济停摆。隔离阻断使工厂倒闭，失业率剧增，经济损失后果严重，长时间持续还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此外，有美国研究称，长期来看被阻隔在家的人们容易患精神病或因郁闷而患其他疾病致死，这种结果可能会超过新冠肺炎所带来的伤害。

贾庆国教授认为，面对低死亡率和隔离阻断带来的限制自由、经济伤害等后果，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决策上显得特别困难，尤其是在所谓的西方民主体制下，大家七嘴八舌，不听科学家的建议，不做科学判断，仅凭自我感受和体验，似乎哪种方案都不好。正是这种决策的纠结耽误了防控的时间，还没等到他们采取有效的隔离阻断措施，疫情就已全面暴发。确诊病例的突然增加，使医疗系统无法承受，结果许多人实际上得不到医治。而在道德选择上，诸如意大利和英国，他们有时在两难境遇下又会倾向于先救治更年轻或能活更长久的人，老年人可能会受到歧视。这些因素都导致大量病人的死亡。此外，西方各国最开始低估了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和

潜在的伤害力，以为疫情离他们很遥远，没有做好基本的医疗储备。

其次，西方国家学错了对象。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人不太愿意学习中国。尽管中国的防疫措施是严格按照科学家的建议进行，并且做得很好，但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许多事情他们无法参照，如封城、严格的社区隔离等。直到后来，由于疫情严重，死亡人数过多，他们才极不情愿地采取了这些办法。西方各国最初学习的目标是日本、新加坡，随后又转为韩国。起初日本给他们的印象是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非常少，并且没有进行阻断隔离，非常人性化，之后他们发现，这是因为日本只对重症患者进行检测，同时还包含对奥运会的考虑，担心数字太高吓跑来参加奥运会的人。而新加坡虽然一开始没有采取特别强硬的隔离阻断措施，但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新加坡是一个人民非常守纪律的国家，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措施阻止病毒传播。然而，新加坡之后却忽视了外籍劳工问题，这个群体几十万人的住宿条件比较差，集体居住容易传播病毒，导致一段时间内新加坡感染人数暴涨。

第三，文化上的差异。东西方文化中最重要差异体现在对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平衡问题上。西方国家虽然也重视群体利益，但他们更重视个人利益，倡导个人权益优先。在他们的观念中，当每个人的个人权益都得到保护时，那么这个社会或群体的权益也得到了保护，即“小河有水大河满”。中国儒家文化同样重视这两方面的利益，但重点是放在集体权益上的，即“大河有水小河满”。从政府角度来说，就是

在一定条件下为了群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权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采取了那么多“极端”的隔离阻断措施，老百姓却基本接受，没有出现大规模反抗。这种情况若放在西方，将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

最后，关于疫情对于中英关系的影响，贾庆国教授认为，疫情之前中英关系已经受到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英国肯定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疫情初期，英国的态度比较傲慢且不重视，认为自己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和制度，而中国则不行。但疫情突然失控后，他们的内心非常郁闷和绝望，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英国国内开始出现指责中国的声音，跟着美国要求中国赔偿，将责任推卸给中国。在其他方面，英国也越来越被美国影响左右，同时一些事件可能会加速这一变化的过程，如最近的香港问题。

总之，对于未来的疫情发展，贾庆国教授认为还有待观察，很难过早下定论。目前看，西方国家下一阶段在应对疫情方面有两个优势：一是感染人数较多，拥有免疫力的人也较多；二是这些国家科研实力仍旧强劲，包括病毒研究、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中国应利用好率先走出疫情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加快复工复产，发展好经济。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则重点探讨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总体上看，他将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归纳为两方面：一是疫情给世界经济按下了暂停键；二是疫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路径，但具体将拐向何处仍需研究判断。

从中长期看，由于当前发达国家和中国都面临着产能过

剩的问题，实际上在疫情出现前，世界经济就已处在恶化的趋势中。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若要保持长期发展，需要科技进步和产品创新，为民众提供新的消费，从而实现新的健康增长。如果没有新产品，就无法带动那么多产业，这将导致各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比如货币政策，它是通过降低利息率来刺激投资。若利息率降到 8%，某一项目的预期收益为 9%，那么企业家就会想投资，但关键在于很多项目是长期性的，而利息率是浮动的，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突然涨到 10%，如此一来项目就会亏损，成为烂账，银行不良贷款也可能会增加，最终演变为银行危机，2008 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再比如财政政策，它也试图扩大需求，降低自身质量，从而埋下债务危机的隐患。因此，苏剑教授认为长期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所刺激出来的经济发展必定是低质量的，只有不断推出新产品才能保证经济持续且高质量的发展，然而现在却没有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产品出现。信息技术产业曾形成过一次产业革命，经历过一个长周期，但现已到了它的末端。

苏剑教授提到，由于世界经济形势本就不好，世界各国都为发展经济而各显神通。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特朗普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做得最好的领导人，他的政策已经偏离了正统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需求管理，而是刺激供给，这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很接近。特朗普的改革就是降低成本，进行大力度减税，并且推行简政放权。他曾扬言要削减几万亿税收，并废除约束企业的法律法规。美国通过减税降费，

居然能使生产成本与中国拉平，其相关措施的实施力度可想而知。一旦成本下降，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将迅速提升，结果是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但值得关注的是，成本是不可能无限下降的，美国的降费减税也是无法持续的，最终仍需要走产品创新的路。换言之，特朗普执政这三年，美国经济表现得确实不错，但它的后劲在衰减，即使没有疫情，其经济衰退形势也会越来越恶化，供给管理和降低成本的效力正逐渐衰减。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意外冲击，这是没有人能预料到的，其结果也很遗憾，大家看到的是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关系在变差，甚至敌意越来越浓。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国际经济环境将全面恶化，对中国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后果。

另一方面，苏剑教授分析了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他认为以往全球化的好处之一是各国都能得益，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分布不均衡，精英阶层受益，草根阶层受害。许多产业迁到国外，并大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产业空心化导致本国工人失业，社会出现“撕裂”现象。与之相对，发展中国家则基本可以全民受益，比如产业转移到中国后，外国投资也相伴而来，结果是中国的就业机会增加，精英和草根阶层的收入皆提高，政府的税收由此也逐步增长。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化的格局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未来国际贸易格局会如何变化仍难以预测。苏剑教授总结称，中国近 40 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好。他观察到在疫情之前，全球化趋势已开始逆转，疫情究竟是加速

了全球化进程，还是对其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同时他还担心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影响，因为中国过去非常依赖全球化，近年来出口贸易额占中国 GDP 的 20%左右。考虑到经济学原理，其外贸所获的利润会在国内进行循环，产生一连串间接效应，这意味着中国 40%的 GDP 都与外贸有联系。所以中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面前，必须考虑在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发展路径等方面应作出何种调整。

在苏剑教授看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疫情对世界经济按下的不是暂停键，而是一个调节按钮，促使世界经济发展路径实现改变，中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再回不到从前。疫情过后世界各国经济会如何？他判断认为，虽然疫情期间经济危机似乎很严重，但这个危机和正常的危机不一样，它纯粹是意外的冲击，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一旦疫情结束，老百姓的生活恢复正常，各行业复工复产，经济又将回到原来的状态。他相信短期内全球经济的走势主要取决于防疫的形势，如疫苗和特效药是否能研发出来，这些决定了此次危机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复工的快慢。此外，这次疫情有可能会催生生物科技领域的一次革命。必须出现新的科技革命才能挽救世界经济，而危机往往会促使科技进步，如二战和冷战加速了信息技术科技革命。现在世界各国在生物科技方面的研发投入都大幅增加，尤其是疫苗的研发，如果由此产生新的科技革命，或许会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一轮的增长。但也应该看到，科技进步是难以预测的，谁都不知道它是否会出现，或者以什么样的成果出现，力度又有多大，在这方面还

得继续观察。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胡莉分享了她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认识。她表示，经研究发现，在英国应对此次疫情的过程中，其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存在效能不足的问题。如英国政府长期对该体系的资金投入不足，据世界经合组织 2019 年的数据显示，相较法国和德国，英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占 GDP 的比例最低，只有 9%左右，而法、德都超过 11%。另一组数据表明，在每一千人拥有的医生和护士数量上，法、德均为各 10 人以上，而英国大概只有各 7 人。可见医疗资源的不足限制了英国的抗疫能力，其治愈率也确实是欧洲国家中最低的。此外，英国医院的床位数量也从 1987 年的 30 万张下降为 2019 年的 15 万张左右，医疗资源非常紧张。

胡莉指出，国家医疗服务效能不足的观点也存在于英国国内，主要流行于公共卫生专家、一线医务人员和一些医疗改革的研究者。曾有一些英国教授在英国暴发新冠肺炎后指责政府，称长期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改革使这个体系处于一个瘫痪状态，导致目前的结构非常复杂。在 1948 年英国建立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之初，它是一个国有化体系，对它的管理由国家行政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医院是国有的，医护人员也都是国家雇佣的，如果遇到卫生危机，国家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可是从 1979 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对国民健康服务体系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其改革导向是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试图把它改革成像今天美国那样的医疗服务体系。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节省国家在医疗领域的开支，可以提

高医疗服务的效率。然而事实上它没能完全改革成功，因为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在英国民众心中有很高的支持率，它无法一蹴而就，只能一点点地改变，这种改革持续了将近 40 年，到 2019 年仍在进行。由此一来，它的结构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目前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许多国有化的医院都已私有化，很多穷人在危机中得不到救治，富人有自己的医生，私人领域的医疗服务逐步发展了起来。

在这次疫情中，英国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例如英国也修建了方舱医院，即南丁格尔医院，但据说只有少部分病人能住进去。英国确诊人数多，医院却空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把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和承担的职能承包给私人公司，如修建医院和招募医护人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没有办法在这次危机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

在讨论环节，与会者们和听众围绕疫情与英国两党政治、新自由主义的未来、英国脱欧后的发展趋势，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等方面展开互动交流。

对于英国政府抗疫举措不佳却没有引发民众不满，以及英国民众抗拒戴口罩的原因，贾庆国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挺难回答，为什么心理上那么拒绝戴口罩？可能还是涉及生活习惯。欧美人很少戴口罩，疫情初期有一个很好的借口，是物资供应不上口罩不够用，因此要把口罩留给医护人员用，但口罩供应跟上以后他们还是不愿戴，说明他们真的没有这种意愿。他们认为戴口罩是一件非常不时尚的事，即使要戴也要选择专门设计的口罩，选择各种各样能显示出时尚标志和艺术性的口罩。特朗普戴的口罩就是专门设计的“总统定

制款”，很多高官、精英人士戴的口罩也都是专门设计的，并不是大众戴的普通口罩。

尽管英国政府的防控表现并没有那么好，但英国人仍认为政府做得不错。从民调情况看，4月26日英国《卫报》报道的民调数据指出，英国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抗疫效果比英国好，但是英国的抗疫效果又比美国好，这就出现了一个相对优越的情况。其实如果按人均角度看，英国死亡率比美国还要高，因为它人口少，但是老百姓的感受却不一样。此外，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做得那么好，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些所谓集权国家才能采取的措施，英国是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的，英国防控的效果不如中国也是有情可原的，所以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英国做得不错。

关于戴口罩的问题，钱乘旦教授认为，其实在西方世界中，口罩不是说不可以戴，而是西方人形成了一种相当固定的思维方式。比如自己如果感冒了，进行严格的自我隔离，把自己关在家里，三五天后感冒自然而然就好了，就可以出门活动了，但感冒没有好的时候必须出门又该怎么办？那就戴一个口罩，由此造成一种心理观念，只要戴口罩就说明这个人一定是病人，这种观念形成后，就造成戴口罩就表明人生病了，健康的人是不能戴口罩的社会共识。但是，新冠病毒却不是一个寻常的东西，防控的结果证明戴口罩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他人。但问题在于，在欧美国家这种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让每个人首先考虑他人，或者说强调整体利益的概念，这在西方文化中是非常缺乏的。

关于英国政党政治会给疫情防控带来怎样的影响，马振

岗大使结合自身过往在英国期间的体验和感受给予了回应。他表示，在他任中国驻英大使时，工党历经十几年在野状态后重新执政，即布莱尔的时代，当时布莱尔的声望特别高。工党制定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在社会政策上更强调公众、社会的事务，经济上则基本沿袭了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后来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社会政治上更倾向于工党，经济上接受保守党的政策，可见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个混合物。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工党既较为重视社会福利，但又无法避免所谓的私有化趋势，到布莱尔执政后期，英国甚至把监狱看管权都承包了出去。因此，英国的医疗卫生制度才会呈现出如此复杂的结构。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到公立医院看病，等候时间长，很多人排队，虽然病房多，但服务质量差。相反，私人医院的医生服务非常好，有问题只要打个电话他们就能到，当然这只是少数人所能享受的福利。

马大使指出，英国一直是比较保守的国家，不太重视变化和突然的改革，只想推行渐进式地改革，如今绝不可能会出现所谓革命性质或者进行政治重大改革的要求。此外，围绕脱欧问题，英国社会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增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势力，成立了许多党派，如独立党坚决要求脱欧，苏格兰党要求苏格兰独立等等。党派的增多意味着观点和分歧的增多，但严格来说许多派别都只是代表某一种看法、某一种利益，并不能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因此他们只会推动小的变化，但不会造成大的变化。

马大使认为，从原则上看工党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倡导社会民主，而保守党是传统保守的政党，但在具体实践中，

同一个党派的不同执政领袖其表现也不尽相同。比如在保守党内，撒切尔夫人执政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催生出“撒切尔革命”，推动英国经济迅猛发展，但其保守党的继任者在一些事情上却偏离了她的路径。同样在工党内，布莱尔一开始雄心勃勃，但后来的工党也放弃了他最初的政策。然而，这两大党从本质上说不会有根本性的不同，都不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党，只是手段上不大一样。所以，很难判断工党上台和保守党上台在应对疫情上会有怎样的差别，而且政府采取何种策略也不是某个人就可以单独决定的。目前约翰逊的上台是非常偶然的现象，因为特蕾莎·梅被迫辞职，保守党推选他当领袖。在这次疫情中，约翰逊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他刚带领英国完成脱欧，下一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需要在民众中维持好名声，所以他会实施诸多有助于民生的政策，否则在下次大选时就可能下台。

疫情之下，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显露无疑，它的未来也备受关注。对此，贾庆国教授认为，讨论新自由主义首先取决于如何对它进行定义，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他判断，新冠疫情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有所冲击，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但这种冲击不应被夸大。未来哪个国家能最快走出疫情，能最快抵制住冲击，或者说能最快重新回归全球化路径，哪个国家就能在经济上占据优势。历史上西方国家加入全球化进程，基本上是自愿的，并非被逼迫，大家都清楚加入全球化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会有安全风险，但更重要的是会带来巨大利益。当前全球化受到相当大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没有解

决好全球化给国内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等种种问题，许多人并没有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好处，反而受到很大伤害。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必然会导致国内政治反弹，比如选出特朗普这样奇怪的领导人。贾庆国教授认为，未来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比较优势，能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同时能解决好国内再分配问题，那么就能更好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和利益。

苏剑教授同意贾庆国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未来新自由主义是否会进行调整，关键在于它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总量上的变化，即是否能刺激经济的总体发展；二是分配问题，它往往会导致国家干预。他指出这次危机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而经济危机则是由其衍生出来的，所以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此次危机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防疫主要属于政治和卫生政策领域。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仍在坚持自由企业制度。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是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因此他认为，英国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即使调整，其力度也不会太大，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虽然短期政策会有所调整，但总体思路或体制问题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关于脱欧后英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贾庆国教授认为，英国脱欧后可能有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战略上可能更加依赖美国，毕竟在安全问题上总得靠一方，中国和欧盟都靠不住，只能靠美国；二是经济上试图谋求多元、开放，希望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好处。但与此同时，英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即一方面它想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利用中国巨

大的市场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对它施加了很多压力，而且它对中国国内政治变化有自己的想法，这都使得它把经贸问题安全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经贸问题，特别是涉及高科技领域，所以它有可能跟着美国在高科技外贸方面对中国加以限制。例如，前一段时间据说英国在华为问题上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执意采用一些它认为不会影响英国安全的华为产品，但最近又有所动摇，称会重新考虑与华为的合作问题，这其实涉及到美国压力、疫情推责、国内政治、香港问题等诸多因素。因此，未来英国会尽可能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逐渐会在战略上尤其是高科技方面与美国站在一边，至少短期内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最后，马振岗大使提醒大家应当思考疫情与世界格局变化的问题。比如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的影响，需要实事求是地探讨。目前相关讨论很多，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但实际情况的发展要比大多数人预期得更为复杂，不能轻易地作出定性判断。以中国为例，在刚刚战胜疫情之初，许多人觉得中国这次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当时世界对中国的赞扬比较多。然而，在这之后却发展为美国联系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个别发展中国家，一同向中国追责，把疫情与国内政治相结合，利用国际环境对中国发难。这就导致中国今后或将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势，需要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再比如对全球化的认识，许多人担心疫情会加速逆全球化或者导致全球化破裂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也不应轻易下结论。因为全球化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国家人为创造出来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一种需求，是科学技

术不断提高的一个结果，是客观存在，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特朗普曾几次想从全球化中退出，但美国的经济势必必然会使他再次走进去，毕竟现代化的生产无法脱离全球化，多国合作生产才是最合适、最方便的方式。如果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涉及生产的许多环节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尽管很多人担心美国将要与中国走向对抗、疏远，甚至断交，但美国是否有胆量走出这一步，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和中国彻底割断仍值得商榷。因此，他同意苏剑教授的看法。首先疫情对劳动生产力没有造成根本的破坏，也阻断不了新科技的发展，目前只是按下了暂停键，一旦各国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对于全球化的需求会自然出现；其次，疫情结束后全球化肯定要有新的发展形势、新的方式和新的改革，但具体怎么改，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新冠肺炎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完全不了解的一种新的病征。尽管称其为肺炎，但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过去人们所了解的肺炎；尽管它也是一种病毒，但和过去人们所碰到的病毒又不同。最初人们都说它非常诡异，但这种新的病毒也给人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不仅涉及卫生方面、医学方面，也涵盖了很多包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等社会方面和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甚至还与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有关。今天参会的三位学者给我们提供的思想是非常珍贵的，也启动了我们思考的发动机。疫情给整个世界带来的了很大的变化，也让人们看清了有一件事是不能去做的，那就是用意识形态对抗科学是不可取的，科学就是科学，是不可抗拒的。

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和各位继续探讨与疫情相关的世界发展问题。